

100年前的1920年3月，在五卅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乃至成立中国共产党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根本解决以前，
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和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对中国的问题，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解决旧中国的问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而理论上的准备和组织上的准备都是不可或缺的。1920年初，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秘密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在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针对多数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比较陌生的情况，李大钊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 于朝霞

团体，来吸引和影响进步青年。

在李大钊的带领和影响下，1920年3月31日，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在成立之初没有公开开展活动，实际运转一年后，经报蔡元培校长同意，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记》上刊登成立启事，对外正式公开活动。启事刊出后，全校为之震动。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也前来报名参加。随后，研究会将启事单独付印，邮寄分发全国各地，外地报名人数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一时大增。见报名者颇踊跃，李大钊喜出望外，对罗章龙说：“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而载入史册。

“以研究关于马克思
派的著述为目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布的成立启事指出，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

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研究方法，以搜集、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文献，召开讨论会、演讲会等为主。自成立到1926年前后停止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这是研究会进行的一项基础工作。研究会搜集了众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后的手抄本，其余的主要是由会员个人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捐献而来。研究会还计划翻译出版共产主义系列丛书10种，列宁系列丛书14种，马克思主义丛书14种。研究会实际从事过《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的十日》和《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在《资本论》第一卷时，罗章龙等人都觉得翻译这本书很难，啃不动，便请德文老师给他们讲解，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最后他们还是把它译出来了。

第二，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研究。研究会成立之初，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等特别研究小组。后增设了10个研究小组，分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

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判”“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研究会会员可同时参与多个小组的活动。在讨论会上，会员可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他会员可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开展辩论和交流。

第三，定期举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演讲会。研究会规定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首先带头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公开演讲，参会人员认真听讲，很多人都作了笔记。黄绍谷记录整理了一份，在2月21日至23日《晨报》上连载发表；陈仲瑜记录整理了一篇，在2月21日《北京大学日记》上发表，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1922年5月5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李大钊、陈启修等应邀作演讲。1923年1月15日，是德国无产阶级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4周年，研究会为此专门举办纪念会。除会员外，纪念会还吸引了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当时，李大钊还与胡适、张东荪等人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展开辩

论，辩论会吸引了校内外很多师生。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解答问题，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传播。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
的结合”

除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外，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是为了以学会友、以研会友，这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一个开创性的重大举措。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初，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Kommunismus的谐音），也即“共产主义小室”之意，专门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多方努力和筹措，至1922年12月，“亢慕义斋”收藏有数百部中、英、德、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其所藏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关键作用。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并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1936年，

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亢慕义斋”虽小，却有乾坤，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像毛泽东一样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鉴于此，李大钊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于是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开始参与北方地区的建党工作。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回忆说，成立研究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研究会19个发起人中，后来有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括李大钊在内，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吴雨铭）、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劼、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0人，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共16人），名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58人名录中。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是中国共产党诞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熊向晖的传奇人生

□ 孙亚杰

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史上，出身官宦之家的“龙潭后三杰”之一——熊向晖是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物。1937年初，年仅18岁的熊向晖，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启了跌宕起伏的特工生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书写了传奇的“敌营十二年”。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在风云变幻的外交战线不辱使命，完成了一项项重要任务，成为共和国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19年4月12日，熊向晖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1936年，17岁的他考入清华大学，其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

1937年6月，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至长沙。这时，湖南要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去国民党胡宗南部“服务”。周恩来吩咐清华大学党的负责人蒋南翔推荐一名秘密党员去参加，选人的标准为“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轻，仪表不俗，记忆力强”等。熊向晖被选中，便由长沙前往武昌接受胡宗南的面试。在接见会上，胡宗南手执名册逐一点名，熊向晖为给胡宗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胡宗南点自己名字时故意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宗南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答：“参加革命。”胡宗南微微一怔，问到：“熊先生来本军是为参加革命？”熊向晖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宗南再问：“那么，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算什么？”熊向晖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胡宗南盯着熊向晖看了一会儿并在名册上作了标记。接见会结束后，胡宗南又单独召见熊向晖，几轮面试结束，他决定把熊向晖留在身边。

就这样，熊向晖成了我党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按照周恩来设想筹划以备在两党和平时，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

用。当时，周恩来送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1938年5月初，熊向晖被派到西安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担任胡宗南的助手，因超卓的才干很快得到胡宗南的赏识，从侍从副官升任至机要秘书，开启了平步青云的“党国栋梁”仕途，也开启了12年之久的中共特工生涯。

“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蒋介石借此密电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秘密布置并正式确定了7月9日进攻边区。但是，7月4日胡宗南就收到了朱德电报，受到“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的指责。原来，早在7月3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就由熊向晖秘密发到了延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作战方案，一方面，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胡宗南发觉有人泄密并进行追查，竟也没想到会是自己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由于处置得当熊向晖的身份没有暴露。

1947年3月，正值胡宗南保荐他赴美留学前夕，熊向晖和新婚妻子正在杭州蜜月旅行，突然接到胡宗南在南京的约见命令，让他心中疑惑不解。见面后，胡宗南要求他推迟三个月赴美，等打完延安再走，并让他严格保密。此前，胡宗南于1947年2月28日接到了蒋介石关于“趁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召开之时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的命令，于是胡宗南临时中止了熊向晖赴美留学的行程。胡宗南交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并向他布置了任务：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作战草图给他。熊向晖打开文件包即看到了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和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迅速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次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回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社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

根据得到的情报，党中央果断决定采取“存人失地”的方针，放弃延

安并坚壁清野，把这个包袱交给国民党去背，然后在陕北黄土高原通过蘑菇战、麻雀战等战术将国民党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以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总是能够一次次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化险为夷并常常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而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军不但未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反而自身损失惨重，麦宗禹、李昆岗、刘堪等胡宗南手下的名将也纷纷当了俘虏或直接丧命战场，真可谓“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

熊向晖的出色表现令毛泽东大为赞赏，称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道：我们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延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外交战线再建功

1947年5月，熊向晖从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1949年5月，熊向晖正式由“地下”转到“地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熊向晖担任了外交部新闻司的副司长，开始了他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在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中都有他的身影：1954年日内瓦会议，熊向晖担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主要负责招待新闻记者；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熊向晖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尼克松1972年访华，熊向晖又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除此之外，熊向晖还担任过驻英国代办、驻墨西哥首任大使等职。这一时期的熊向晖又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熊向晖的女儿熊蕾曾问过父亲一个有趣的问题：“你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熊向晖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是的，熊向晖不会跳舞，但他在情报与外交的舞台上屡屡建功。2005年9月，这位充满传奇的共产主义战士停止了人生的脚步。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在艰苦的环境中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建立起了类型多样、系统有别、层次各异的干部教育培养体系。其中，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是中央苏区党政干部教育的“双星”，分别成为当今党政干部教育的最高殿堂——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摇篮。

中央党校的办学起源——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26年2月党中央就提出了“开办最高党校”的政治主张，充分反映了通过创办中央层面的高级党校推进干部人才培养的强烈愿望。但在国民党政权的白色恐怖下，直至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在原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办学基础上，通过集中“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于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苏区的腹地瑞金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明确赋予了其中央党校的职能定位。

首任校长任弼时在开学典礼上强调：“要培养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工农大众的干部。”根据培养目标并结合干部实际，学校涵盖了高中初三三个办学层次：（一）学习时间为两个月的初级训练班，主要是面向基层造就新苏区（包括白区）的工作人员；（二）学习时间为四个月的中级训练班，按工作性质分为党、团、苏维埃、工会工作四个班次进行设置；（三）学习时间为六个月的高级训练班，主要培养苏区各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工会选送的高级干部。在学习科目的设置上，根据各班次类型与层次的不同有所侧重和差异，主要包括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中共党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特点。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开中央党校的办学历史，成为我党培养造就高中级干部的摇篮，学员毕业后均被“分配到红军和地方成为党的工作骨干”。从1933年3月创办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停办，它在约一年半的办学时间内共计培养了300多名苏区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干部，在紧张动荡的战争形势下造就了一批具有较高马列主义水平与实践斗争经验的宝贵干部人才，为中国共产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中央苏区在举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同时，由于“环绕革命战争的每个重大工作，如查田运动、经济建设、工人斗争、文化建设、财政工作、肃反工作、道路建设、

新苏区的发展以及目前的选举运动，都需要大批干部”，1933年8月经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讨论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并成立了毛泽东亲任校长的大学委员会。

《苏维埃大学简章》第一条就开宗明义：“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为任务”，强调以培养苏区建设急需的“专业型”干部为主要职责。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指出：苏维埃大学学生“应该学习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学习过的”，直接点明了它的办学宗旨和任务。从干部队伍的实际出发，学校按普通班和特别工作班两个层次招生，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其中普通班为预科班性质，主要是针对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先期进行的文化补习；特别工作班在专业上起初设有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和司法八个班，后根据需要又增设了外交、粮食两个班，它们分别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九部一局”相对应，直接面向苏维埃政府开展的各项主要工作，带有显著的政府与学校“联合办学”“委托培养”干部的性质，呈现出很强的“专业对口”特点。在课程设置上，“包括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其中的百分比比例照修业时间长短和环境需要来决定”。各班次的学制均为半年。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入危急阶段，根据1934年7月1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苏维埃大学整体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其不到一年的短暂而光荣的办学历程中，先后招生1500余人，为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培养输送了大批拥有较强专业特长的急需人才，成为推动苏维埃运动的骨干力量。

两校成为中央苏区时期办学定位互补、功能交相辉映的干部教育培养重要阵地。在紧张激烈的战火中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与苏维埃大学，它们均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应运而生。作为中央苏区具有重要指向性意义的最高学府，两者分别由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行政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办，在紧密服务于党和苏区政府中心工作的整体格局中，各自侧重于培养苏区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两种具有差异性功能定位的干部类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在干部人才的教育培养方面呈现出有声有色的异曲同工之妙，共同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党政干部教育培养的主干渠道。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与苏维埃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 党政干部教育的摇篮

□ 张 锋

大学通过明晰的办学思路、独具一格的培养模式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手段，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培养了一大批政治过硬、专业精湛、德才兼备的高中级干部人才，对扩大苏区干部数量、提升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干部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巩固壮大苏维埃红色政权发挥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反“围剿”斗争和其他各项革命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以两校的创办为重要标志，使我党的干部人才培养从此前较为零散、碎片化的活动，开始进入到了较为系统、正规化的阶段。作为中央苏区干部人才教育培养的“国家队”，它们有力地示范和带动了苏区其他干部教育活动的开展，对此后党和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干部教育培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成为延安时期党的干部人才教育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历史前奏，更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推进党和国家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